

中共广州市越秀区委宣传部
越秀区社区教育学院一院 主编

儒林芳草

RU LIN FANG CAO
GUANGZHOU SHIYUAN SHI HUA
广州书院史话

叶曙明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全国优秀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广东教育出版社

中共广州市越秀区委宣传部 主编
越秀区社区教育学院一院

儒林芳草

RU LIN FANG CAO
GUANGZHOU SHUYUAN SHI HUA
广州书院史话

叶曙明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全国优秀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广东教育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儒林芳草：广州书院史话 / 叶曙明著.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2015.10

ISBN 978-7-5548-0124-6

I. ①儒… II. ①叶… III. ①书院—教育史—广州市
IV. ①G649.299.6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13938号

责任编辑：李木子
责任技编：杨启承
装帧设计：王珏婷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472号12-15楼)

邮政编码：510075

网址：<http://www.gjs.cn>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14印张 275 000字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48-0124-6

定价：48.00元

质量监督电话：020-87613102 邮箱：gjs-quality@gdpg.com.cn

购书咨询电话：020-87615809

序

两千多年来，广州一直是岭南文化的中心地、广府文化的核心地。在这一文化地位的形成过程中，广州的古书院无疑居功至伟。据考证，中国古代书院的名称始于唐代，最初是官方修书、校书和藏书的场所，后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而广州以南宋时开办的“岭南第一儒林”——广州府学为发轫，办学风气遂兴于广州、遍及岭南，并促使广州的书院形成了集藏书、修书、读书为一体的独特优势，以学者研究学问、学子求学修身的风貌傲立教育之林，成为广州教育史上与中原文化并艳的一朵奇葩。

广州记于史籍最早的有讲学活动且规制基本完备的书院，是南宋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由番禺人“端懿先生”梁百揆创办的禺山书院（今广州都城隍庙西侧）。该书院是广州历史上最长寿的书院，并与其南400米之广州府学、东500米之番禺学宫，形成了广州历史上最早的一个文教区。到明代中叶以后，广州书院的发展进入高潮，白沙书院、濂溪书院、迂冈书院、慎德书院等相继创办，庠序大兴，学府、书院相映争辉，官学、私学相得益彰。及至清代，广州书院在数量上跃居全国之首，仅越秀老城区内便达数百家，且分布集中，在今北京路一带形成以贡院（今越秀中路）、学政衙门（今西湖路）和越秀书院（今北京路）为核心，全国罕见、空前绝后的书院群。在大、小马站和流水井一带，还有大批由宗祠改成的书院，既是当时教育体系的重要辅助形式，也对当时的广州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堪称广州文化教育史上的耀眼明珠。

在广州书院数百年的历史长河中，遍布着广府星光熠熠的众多历史文化名人：南宋崔与之、李昉英、方大琮、周敦颐，明代陈献章、湛若水、黄佐、

伦文叙、何维柏、黄衷、杨起元，清代阮元、张维屏、陈澧、康有为、梁启超……直到光绪三十年（1904）废除科举为止，这些广府文化大师引领了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造就了广府灿烂文明。

近年来，作为广府文化的核心地，广州市越秀区致力于挖掘、整合、提升和宣传辖内丰厚的广府文化资源。在省、市大力支持下，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拟落户于北京路大小马站。同时，越秀区还全力打造 10 平方公里广府文化博览区，致力于重现 5.2 平方公里书院街的人文景观，作为北京路文化核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积极配合推进北京路文化核心区建设，深入发掘广州书院文化的多重价值，弘扬广府文化，越秀区社区教育学院一院邀请广府文化专家叶曙明先生编撰了《儒林芳草：广州书院史话》一书。本书运用丰富的历史资料，图文并茂，生动而真实地再现了广州书院的发展史，让读者在了解历史的同时，获得文化熏陶和审美享受。

文化是民族之魂、城市之根，教育是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广州书院不仅打下了越秀教育强区、文化大区的深厚基础，而且搭建起广州老城区经济社会复兴的文化平台。广州书院故地不仅居于北京路文化核心区的中心地带，更是此核心区乃至广州的精神高地。越秀区最宝贵的就是历史文化遗产和人才教育资源，我衷心希望《儒林芳草：广州书院史话》一书能够让广大社区居民更加了解广州的书院文化，更加珍惜广州的历史文化资源，与时俱进地弘扬广府文化，在全民学习、提高公民素质的热潮中，不断延续广州千年文脉，永葆广州发展的生机和活力。

原广州市市长：


2015 年 2 月

目录

宋元书香祀先贤 2

光风霁月儒学兴 2
禺山书院与端懿先生 8
番山高，濂溪长 14
七檐滴水的玉壘书院 19

真儒复出的年代 26

白沙先生的圣贤气象 26
越王台畔书院群 32
一泓甘泉润天关 44
悬车讲学，云桂发祥 52

风雅兴衰嘉靖朝 58

风生水起书院盛 58
毁淫祠，兴教育 62
晚景园与矩洲书院 68
岭表群儒 72

悲剧时代的挽歌 80

万历小阳春 80
赤岗塔下李待问 84
寄迹书院的狂士 89
云淙碧血 96

蕙草春风吹又生 102

历史的拐点 102
粤秀书院，撷秀育英 109
越华书院，商海儒风 116
康基田种福田 126

南学繁果满枝头 132

羊城雄，西湖丽 132
学海无涯 140
菊坡与东塾 152
应元书院显瑞兆 160

千年书院的绝唱 170

广者大也，雅者正也 170
万木森森一草堂 179
宗祠书院遍地开花 188
桑榆深处老书院 201

荣耀谢幕 209



宋元书香祀先贤

光风霁月儒学兴

宋开宝四年（971），广州全城大火。

宋军攻入南汉兴王府（今广州），四面纵火，南汉皇帝花了五十年所兴建的珠宫贝阙、阆苑琼楼，一朝尽为灰烬。一座金碧辉煌的王城轰然倒塌了。

虽然南汉被历史学家描绘为一个穷极奢华、荒淫无度的时代，但可以肯定，南汉是岭南文化史上一个重要分野。南汉在岭南立学校，开贡举，设铨选，一切按照盛唐规模。当时为了逃避五代十国之乱，许多世家嫡宦子孙，纷纷逃往岭南，南汉朝廷都一一妥善安置，从而创造了一个“名流毕集，分任得宜，岭表获安”（《南汉书》）的稳定局面。

随之而来的宋代，在中国古文明史上，写下了最灿烂辉煌的一页。广州人在南汉的废墟上，筑城墙、浚河涌、架桥梁、辟街道、修房子、作器皿、开商店、通货财、扬帆出海，重开海上丝绸之路，每天风帆如织，百货汇聚，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两百多年间，广州一跃而为天下闻名的东方大港。

那是一个让人心驰神往的年代，造船、航海、医药、农业、手工业，欣欣向荣，尤其是造纸术和印刷术，已日臻成熟，为大量出版书籍，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由于宋太祖立下“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祖训，宋代的学术环境，宽松自由，影响中国思想界数百年的理学、心学，便是这个时候孕育而出，撑开一片繁枝茂叶。不仅在哲学方面，

而且在武学、律学、画学、书学、医学等方面，都取得长足的进步。难怪文史大家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

（《金明馆丛稿二编》）

宋庆历年间（1041-1048），朝廷下诏兴学，广州郡守奉诏在番市（今光塔路附近），将一座孔庙改建为州官学。从此冬夏诗书，春秋礼乐，兴起一派肃肃雍雍的气象。

宋代的地方行政区分为三级：路、州、县。广南东路管着广州，广州管着南海、番禺、清远、东莞各县。路一级不设学校，只负责督促州、县置学。因此，地方的官办学校只有两级：州学和县学。由于官学往往与孔庙一起，故又称儒学、庙学。县学生考试成绩好的，可升入州学；州学生考试成绩好的，可升入太学，也就是中央办的学校；太学毕业，就有做官的资格了。

广州学宫设立后，先后搬过几次家。绍圣三年（1096），章粦任广州知府，再把州学迁到番山之下，即今天的广州市第一工人文化宫处。那时，这里山水自然环境，美不胜收，前有玉带城濠，风递水香；后有禺山高坡，聚星梯云；左有文溪，右有仙湖，枕山临流，云水趋奔。

不过，也不是十全十美，不足之处在于州学大门正对着城墙。按照风水先生的说法，城墙属土，“土星高大厚而端，牛背屏风总一般”，气脉未免壅窒。气脉壅窒则庠序难以兴盛。于是，绍兴二十七年（1157），由经略苏简在城墙上开了一个门，名为步云门，作为补救，后来改名为冲霄门（即清代的文明门，如今文明路的名字，由此而来），都含有“平步青云”的意思。从名字的变化，可以看出，这个城门与教育和科举，有很大的关联。广州的最高学府，从此便在这里安下了家，一直到清代，再也没有搬迁过。

明、清时的行政区，大致上分为省、府、县三级，不再有宋代的“路”一级了。原来的州学，改称府学。经过若干代人的经营，广州府学规模宏大，殿庑敞奥，四周佳木葱茏，春来红棉怒放，夏至榕荫蔽天，青青子衿，就读馆中，春弦夏诵，讲道论德，足以召和气之祥，崇斯文之福，所以有“岭南第一儒林”之称。

直到民国初年，广州人都习惯把府学叫作“夫子庙”，因为学宫里有大

成殿，供奉着万世师表孔子和七十二贤牌位。在府学东西两侧，各有一条小街，西边叫府学西街，东边叫府学东街。在1918年的城市建设中，府学东街因为要拓宽为文德路，把夫子庙拆毁了，而府学西街至今尚存。

在离广州府学不远处，就是番禺学宫，这是县一级的官办学校。番禺县学最早附设在州学西庑，南宋淳祐元年（1241），在城东南五里处的江边，兴建学宫。门墙之外，便是浩浩大江，潮声落时书声起，渔灯照君读春秋。

南海县学创设于嘉定二年（1209），其位置按清康熙三十年（1691）修的《南海县志》记载，在“县东六十步”。古代的计量单位，一步约为六尺四寸，如果“县”是指旧南海县衙（今旧南海县街），那么“东六十步”，即大约为一百二三十米，就是在惠吉东、惠吉西附近，与崇报寺相邻。

南宋灭亡后，番禺、南海两学宫均遭到严重破坏，百年基业，毁于一旦。元代至元三十年（1293），南海县在广州城西高桂坊崔菊坡祠旧址（今学宫街）重建学宫，经过历年修葺扩建，其面积“地纵六十五丈，横二十八或二十五丈”，即大约有1.6万平方米，戟门、泮池、大成门、露台、大成殿、聚奎楼、乡贤祠、名宦祠、尊经阁等，依次而建，重檐崇基，肃如焕然。

而番禺学宫没有南海学宫幸运，一时无力重修，只能暂时依附于南海县学，把学宫一分为二，东部属南海，西部属番禺，各招生员，你讲九经，我讲三史，士气儒风，亦蒸蒸然。明洪武三年（1370），番禺县终于在广州东城外



远景为五仙观建筑

大兴土木，重建学宫。番禺的邑绅早就盼望着这一天，纷纷奔走相告，踊跃捐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学宫很快就建起来了，规模宏整，不让南海学宫。洪武十三年（1380），广州三城合一，番禺学宫被划入城内。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沉闷的朝代之一。不仅经济发展缓慢，文化亦陷于低迷。盛唐遗风，在中原早已尘消烟灭，散曲杂剧当令，文人趣味沉溺在刻翠剪红、纤巧颓靡的风气中。然而，这时的岭南文风，依然圭臬盛唐，元气浑然。广府学宫建起了一座大型图书馆——云章阁，收藏经、史、子、集诸书达三千六百余册。经筵讲官吴澄在参观云章阁后，百感交集，写下了一篇题记：

广郡虽僻居岭海之间，去天万里，而德音所暨，无异輶轂之下，况又储贮圣经，士得朝夕诵读，熏蒸渐渍，则气质之偏、风俗之窳，皆可变化而淳美。安知今之交广，不为古之邹鲁也？然则斯阁之设，岂徒侈栋宇之巍峨，耀金碧之辉煌，以骇观瞻而已乎？阁之所藏，有史有子有集，皆经之副也，其善可以式，其不善可以鉴，而经则其本也。藏之在乎阁，而学之在乎人，经之所载，圣人之道也，穷年读诵而不明其道，是终日饮食而不知其味，虽曰学犹未学也。其必精研于心而有实见，力践于身而有实用，以之事父则孝，以之事长则弟，以之事君则忠，居官而能廉，临人而能爱，为国办事，无施而不宜。（引自清同治《番禺县志》）

当我们追蹊先师足迹，重温书院历史时，这段文字，为我们道出了先师们当年办学校、兴文教的宗旨，道出了古代教育家们的理想与追求，即使对今人来说，仍不失为一种宝贵的教益。

清代，广东文教在全国后来居上，领风气之先。广东状元庄有恭，乾隆年间做过江、浙、鄂、闽四省巡抚、两江总督、刑部尚书，他是广州人，故居就在禺山之麓的旧仓巷，他对广州文教昌盛、英才济济，赞不绝口，在一篇文章中，自豪地写道：“五岭之南，郡以十数，县以百数，幅员数千里，咸执秩拱稽，受治于广州之长。而广州之县二，曰南海，曰番禺，俗尚淳美，人才众多，彬彬乎有邹鲁风。”（引自清同治《番禺县志》）

这并非一日功成，而是经历数百年的沉淀积累，一代一代的志士儒英，

薪火相传，金声玉振，才有如此盛大的气象。

今天，走在文德路、中山路上，车水马龙，人如潮涌，广州府学与南海学宫都已难觅遗迹了，唯有番禺学宫硕果仅存。每当夕阳透过密密的树荫，洒落在那些巍峨的大殿、牌坊、棂星门和黄色琉璃瓦上，犹如镀上淡淡的金辉；清风徐来，泮池泛起粼粼波光，明伦堂前那块“文武官员至此下马”的石碑，仿佛在夕阳下述说着



南海学宫故址

千百年前古圣先贤的故事，先师们冠佩俨然、仪度雍雅的身影，仿佛再一次从那道拱桥上缓缓走过。那些让人感怀不已的场景，总能像一首优美的乐曲，扣动我们的弦。

唐、宋以降，官办学校的主要功能，在于崇先圣，明人伦，昭化治。其课程内容与科考内容，紧密衔接，朝廷甚至规定，不读官学的士子，不能参加科考。所以愈来愈多的人，为了科考而入官学。从严格意义上说，官学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教育机构，而是一个与科举配套的人才选拔机构。对学术理论，官学并不进行自由讲学与研习，有课士而无教士，这就是所谓的“课而不教”。

由于官学功能受到这样的局限，从宋代开始，人们就意识到，仅凭官学，仍不足以兴文教，必须要有另一套系统，通过自由讲学，开启智慧，传授治术，教养人才，传延儒家精神与内涵，裨补官学“课而不教”之失。

于是，书院出现了。



番禺学宫旧貌



番禺学宫今貌

禺山书院与端懿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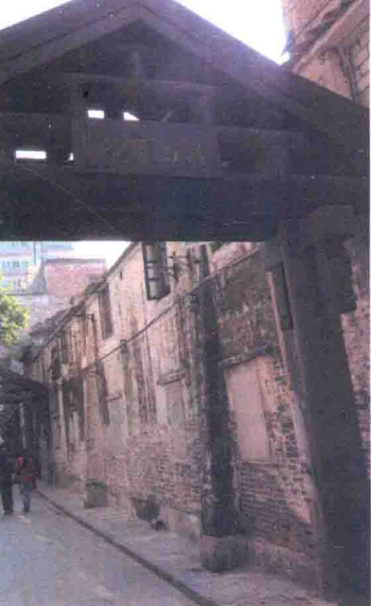
古代的学校有很多种，诸如“国子监”“州学”“县学”“乡学”“义学”“社学”等，但没有一种名称，能像“书院”这么典雅，让人一看见它的名字，仿佛已闻到清幽的书香，就好像置身于一个红墙绿瓦的院子里，春水绕门，窗明几净，四壁是满满的书籍，窗外风铃丁丁，窗内书声琅琅。师生之间，执经问难；同学之间，相切相磋。此情此景，是每个读书人梦寐以求的生活。

书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盛唐时代，如果“精舍”亦归入书院类，则可以上溯至两汉时代。但那时的书院，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学校，而是一种类似于出版社和图书馆的结合体，是修书、校书、藏书，供私人读书的地方；或以纪念先贤谥宦形式出现。历史学家已经肯定，唐代开元六年（718）唐玄宗在洛阳建立的丽正书院，号称中国第一所书院，就是一所修书机构，而不是教育机构。

岭南早期的书院之一，北宋景德三年（1006），由英德郡守王仲达所创建的涵晖书院，到底是怎样的规模？有没有讲学？由于历史资料阙遗，近代学者刘伯骥推断：“也许亦不出于书舍性质。”（《广东书院制度》）

历史上，私学往往被边缘化，战国“塞私门”，秦代“禁私学”，都把私学排斥在官方的教育系统之外。然而，到了宋代，风移俗易，以广州府学为发轫，办学校的风气，吹遍岭南。南渡以后，更加灿然可观，广东全省所有州和一半以上的县，都开办了学校，既有官学，亦有大量私学涌现，“学在官府”的垄断时代，从此结束。

官学与书院的功能，各有不同，清代学者吴尚友作过解释：“儒学诸生与司铎往来颇疏，或有因试事而数月不见者矣，或有路远而终岁不得一见者矣。若夫义学（书院）萃师徒于一堂，昼有讲，夜有读，讲业请益，定期角艺，无风雨晦明之间，有赏奇析疑之乐。此义学之设，其有裨于生童，与儒学并重而不可缺也。”（《回澜书院记》）也就是说，官学的师生关系，比较疏远，平时很少见面，除了考试，有时几个月才见一面，有些路远的，甚至一年也



禺山书院

见不上一面。而书院师生则经常在一起，朝有讲学，夜有自读，学生请益，老师传授，对学童学习大有裨益。

这是一段光风霁月的年华，值得用浓墨重彩去书写，不过，当后人回顾这段历史时，难免会追根问底：广州第一所书院，究竟诞生于何时何地？可惜无人可以确切回答，只能说，广州第一所有文字记载的书院——禺山书院，诞生于南宋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

禺山是广州城里的一座名山，与番山齐名。明末清初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描画了一幅壮丽的山川图：“会城中故有三山，其在番禺治东南一里曰番山，迤迤而北一里曰禺山，其北曰粤秀……三山之脉，自白云蜿蜒而来，为岭者数十，乍开乍合，至城北耸起粤秀，落为禺，又落在番。禺北番南，相引如长城势，至珠江而止。”

历年考古，在禺山旧地发现了南越王宫署遗址、唐代大型建筑遗迹和南汉宫殿遗址。可见在古人眼中，这是全城的明堂位。据说，曾经有一位精于堪舆术的潮州人，对辨别地脉风水很有心得，因为看中广州山水雄秀，全家搬来定居。有一晚他夜宿越秀山上，五更时分起身望气，只见城东苍烟浮动，云蒸霭霭，弥留不散。他循气脉而行，到了禺山的旧仓巷，不禁惊叹：“满城郁葱佳气，萃于此矣。十年内必发鼎甲。”

禺山书院的位置，大约在今城隍庙西侧。选择这个地方，绝不是偶然的，反映出主办者的慧眼；它能够成为第一所有文字记载的书院，而且是广州历史上最长寿的书院，也绝不是偶然的，因为它占了一块风水宝地。这里向南四百米是广州府学，向东五百米是番禺学宫，形成了广州历史上最早的一个文教区。

在某些史籍上说，创办禺山书院的人是方大琮。这是一个以讹传讹的谬误。虽然方大琮与广州书院也有一段很深的历史缘分，但这个时候他还没登场。



他是禺山书院开办 18 年后才到广州。

禺山书院的创办者是梁百揆——这个名字将永垂岭南教育史。

梁百揆，字宗盛，广东番禺人。出生于诗礼人家，父亲梁仲钦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儒者，尤精性命之学，被后人称赞为“纯儒”。梁百揆幼承庭训，博览经史，南宋嘉泰四年（1204）乡试第一。嘉定十年（1217）中进士，历任从事郎、太学录、符玺郎、奉议大夫，在朝中以直谏敢言著称。

嘉定十七年（1224），宁宗驾崩，丞相史弥远发动宫廷政变，矫诏废皇储，立理宗。当时中原大地，处处烽火，女真人才去，蒙古人又来，铁骑纵横，满目疮痍，南宋江山，内忧外患，愁尽秋风愁秋雨。梁百揆是一位忧国忧民的士大夫，深知历朝掌故，废立之争，从来都是祸胎，他不忍见奸臣乱政，便向朝廷称疾乞休，一巾华发返故乡。

那时北方兵荒马乱，远在五岭以南，大海之滨的广州，虽然保持偏安，但受到政局的影响，海上丝路式微，贸易呆滞，海盗横行，吏治败坏，忠良



在博物馆中展出的旧禺山风貌

贤士对朝廷“直把杭州作汴州”的现实，既痛心疾首，又看不到出路，社会上弥漫着一种末世感。梁百揆在广州禺山创办书院，聚徒讲学，以期辟异端，彰圣学，振士风。

关于广州书院的故事，由此而缓缓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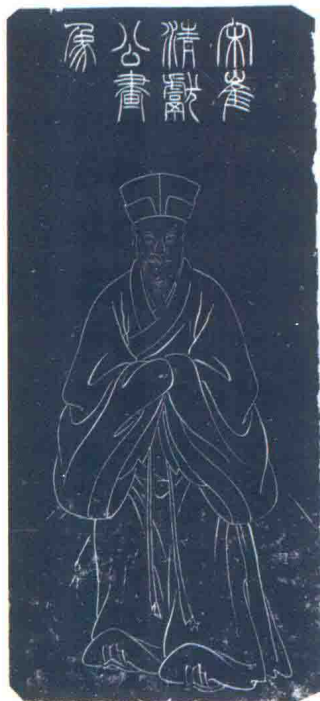
明代名臣海瑞盛赞梁百揆：“当南渡时，不因官爵而变学守，唯以道德而范乡邦，世皆以‘先生’称之。”（《梁端懿先生墓志铭》）禺山书院一改官学“课而不教”的旧例，让士子游息有地，请业有师。梁百揆被尊称为“端懿先生”。这称呼有两重意思，一是形容梁百揆端庄纯正，二是宋代理学大师程颢的儿子也叫端懿，由此可见其理学师承。

理学是被理宗皇帝钦定为唯一正统的学说，而广州是理学南传的重镇之一，衣冠之气，方开未艾，就在禺山书院开办前后，广州儒林还有两件大事，值得留下一笔。

第一件大事，崔与之辞官归里。崔与之，号菊坡，广东增城人，绍兴四年（1193）殿试考中进士，成为岭南由太学取士

的第一人。他主政两淮及四川多年，外拒金人，内立军政，政绩卓著。这一年，他奉召入京任礼部尚书，川民攀辕卧辙，哭声动地。但崔与之并没有入京，而是回到广州定居，埋首学问，他的府邸“晚节堂”就在今崔府街内。

崔与之的出现，对广州的文化学术而言，有着另辟一章的意义。当时岭南聚集了大批理学名儒，各开书院，训诲生徒，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七人：周舜元、李用、翟杰、简克己、陈去华、梁百揆、陈庚。其中简克己、陈去华和梁百揆都在广州授业。崔与之是简克己的私塾弟子，继承了南轩之学“以真知实践为事功”的学术精神，他的辞章被认为是“开岭南宋词之始”，他所开创的“菊坡学派”，



崔与之石刻像